

# 目 录

序	黄淑婷
作者中文版前言	1
鸣 谢	1
引 言	1
<b>第一部 人类学业绩长存</b>	1
<b>焦点之一 梁钊韬的七十寿辰</b>	3
<b>第一章 十年的变化</b>	5
复 苏	5
在中大再生	12
第二个人类学系	19
<b>第二部 引进的学科 (1898~1949)</b>	25
<b>第二章 引介外国学说</b>	27
早期的样本	27
外国奠基者	34
诸多学科之父：蔡元培	38

<b>焦点之二 林惠祥：梁钊韬的良师益友</b>	46
<b>第三章 外国来访者</b>	50
功能主义来到中国	50
在华的外国人	57
学术领域之外的发展	62
抗日战争前夕	63
<b>焦点之三 中山大学与杨成志</b>	65
<b>第四章 中国西式人类学的成熟</b>	74
抗战年月	74
更多的外国训练：效法美国、法国和英国的 人类学模式	81
抗战以后的繁荣	90
对解放前人类学的一个评价	94
<b>焦点之四 解放期间的梁钊韬</b>	101
<b>第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与         苏联模式（1949~1960）</b>	103
<b>第五章 过渡时期</b>	105
新社会	109
人类学思想的转变	114
<b>第六章 重新定向</b>	122
新模式	122
学术界的调整	124
重组人类学	127

少数民族识别	140
<b>第七章 学习老大哥</b>	145
俄国人来了	145
苏联访问者	149
苏联思想	157
兄弟反目	166
<b>第八章 田野工作</b>	175
语言调查和语言改革	175
社会历史调查	181
田野工作留下的财富	189
<b>第四部 “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 (1957~1978)</b>	195
<b>第九章 以毛泽东化为中国化的标志</b>	197
反右派运动前夕的学科体系	197
反右派运动和知识分子	201
学术批判	205
大跃进时期的人类学	213
60年代初期“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	222
<b>焦点之五 梁钊韬和新中国 (1949~1964)</b>	232
<b>第十章 人类学学科的解体——文化大革命</b>	245
以知识分子为革命对象	246
“取消”民族学	250
冲击	254
无产阶级教育	263
政治遗留问题	270

焦点之六 梁钊韬：下放和平反	272
人类学界的人民之敌	272
重振考古学	276
<b>第五部 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学科：     中国模式？</b>	<b>283</b>
<b>第十一章 外国人类学又回来了吗？</b>	<b>285</b>
久违之后	287
西方人类学再次来到中国	297
普世性科学还是民族国家科学	298
<b>第十二章 人类学中国化</b>	<b>311</b>
本土化	311
以马列主义为基础	314
中国人类学的“特色”	320
学科体系中国化：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	322
再度毛泽东化？	326
中国化了的中国人人类学	328
<b>第十三章 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b>	<b>329</b>
焦点之七 梁钊韬：墓志铭	338
跋	341
参考文献	342
译后记	367

第一部

人类学业绩长存



## 焦点之一 梁钊韬的七十寿辰

中央会客厅内人声鼎沸、教职员工以及他从前和现在的学生济济一堂。在沙发和椅子摆成的U形区的一隅坐着接受祝贺的寿星——人类学系的创始人梁钊韬教授。这天是他的七十寿辰。一张红底黑字的大横幅上印着颜色鲜艳的“寿”字。人类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从横幅底下站起来，向到场的100多人致意。这位书记列举了梁先生一生的成就：建立人类学系，发现史前的马坝人头盖骨，并且培养出一批批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学子。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从中间的席位上站起来，转达了中山大学党委会对梁教授的祝贺。然后他问校长是否要发言，校长谢绝了，表示赞同前面几位的发言。

此后，庆贺仪式的主持人，语言学教授庄益群就请我——人类学系该年度的访问教授发言。由于庄教授事先已经让我做好准备，因此我就老实地站了起来。我赞扬了梁教授全身心地致力于他的学科的复兴工作的精神，并告诉所有的在场的人，国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梁教授的成就。最后，梁教授自己站起来发言。

起初梁钊韬先生的声音很小，后来就越来越活跃。梁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类学的看法。他表示，在和其他人一起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

了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内在的联系，而在考古学、语言研究与民族学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相互联系。他总结道，和美国一样，社会主义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是一门“四个学科”的体系，但它同时还必须包含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

梁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愿意为这一学科、为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服务，他手舞足蹈地说道：“无论学校让我去哪儿，去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发言中梁教授表达了对中大党委书记的谢意，并自豪地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学系的博士，其中包括两三个在中国取得学位的——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开端——和由系里派到国外去深造的研究生。

此时，来宾们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到了允许来宾们自由发言的时间，底下的嘈杂声就更大了。梁教授的同事和以前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集这两个身份于一身）朗诵献给教授的诗或是说一些感谢教授这些年的教导和鼓励的话。庄教授送给梁先生一本他过去和现在的学生写给他的小集子。最后，大家分享了一块生日大蛋糕，此时，中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向来宾们道别后离开了。

1986年6月26日，在中大校园内的一个餐厅里又举行生日宴会。摆了十来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十几个赴宴的人。简短的祝辞和梁先生的发言都淹没在了来宾们的闲聊声中。看起来除了我和我夫人，其他人对此都没有意见，他们或许认为，这个夜晚的意义不在语言中，而在于庆贺活动本身。中大的前任校长、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在首席就座，他们向梁钊韬教授敬酒，对梁教授在人类学这个时常遭到攻击的领域内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共同的敬意。而仅仅十年前，他们的前任中没有一个人会在公开场合和梁打招呼。

# 第一章 十年的变化

## 复 苏

1976年，梁钊韬还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祝贺，更不要说是他所在单位中山大学的领导们的祝贺了。被从广东省北部的“五七干校”召回来之后，他在家里仅呆了4年时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反知识分子的热浪也有所减退。国家文物局的当权派们决定，中山大学应当有一个考古学专业，而像梁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他们的帮助对完成学校的重建工作却是不可或缺的。

全国许多院校和博物馆都恢复了考古学。古人类学也得到恢复。然而，民族学、语言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仍然受到禁锢：政府指责它们是“资产阶级学科”。这些体系尽管在名称的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实际上，它们经常假借“少数民族研究”或“民族工作”之名出现。

在各大学，“工农兵学员”坐在刚刚重新敞开大门的教室里，专门监视那些从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回来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几年内，社会科学依然落后于自然科学，但是又试着开始出版学术刊物了。环境有所改善——实际上，仅仅是重新开放各大学就是一个好的迹象。然而，人们内心却还忐忑不安，担心这种好景不会长久。

事实很快打消了人们的顾虑。1978年12月中旬，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全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阶级斗争不再是重点，农民的收入与农业产值挂钩，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大权，他的一些支持者们又回到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岗位上（Rosen 1984：6；Rozman 1987：637）。

前一年，同样的党的会议上确定了到公元2000年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这已经预示了随后这些举措的出台。华国锋主席强调群众在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而邓小平却强调要依靠与政治无关的专家们的力量。到1978年后期，华国锋要被邓小平取代的趋向已经很明显，而政策的改变也开始昭示这一权力更迭的到来。到11月，剩下的所有“右派”都官复原职，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还取消了对进行“自我教育”——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要求他们洗刷自己的罪行——的从前的剥削者的阶级成分的划分。看起来转变真的就在眼前，而在12月的会议上，这一点得到了证实（Rosen 1984：6~7）。

这种新的转向强调技术专长，于是就要求教育系统作根本性的改变——从以前的重视正确的政治思想与行为到现在的重视学术与教育水平。中学，甚至是小学，都在努力促使学生攀登教育的阶梯（Rosen 1985：817）。在所有的努力中，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为业已恢复的全国高考作准备。有潜力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入学的前两年就不再被要求参加劳动了。30年来，过去的剥削者家庭的子女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报考大学（Pepper 1984：3）。

同一时期，社会科学也开始更新。外国和华侨学者长期以来建议，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应该发展社会科学——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现代化的社会，这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和他的高级顾问之一胡乔木被说服了。

胡乔木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部门的一名核心人物，他签署了指名要求恢复一些学科的命令。1977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提出重建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及其研究、法律研究、人口学、政治学，最后甚至于连民族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也包括在重建之列。<sup>①</sup>

不过，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期望只有到了1978年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也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能在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些学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影响。这两大学科中，首先重建的是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一年前才从中国科学院内部分化出来的机构的倡导下，1979年3月召开了“社会学重建大会”，胡乔木亲自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该会有50名成员，年高德韶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选为会长。<sup>②</sup>1982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年会，并在会上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Chu 1983：4；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562~563；阎鹏 1990：14；袁辑辉 1983：21）。社会学界的前辈吴文藻出席了成立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言说自己被这个关于“社会学和现代化”的会议深深打动，并表示，从今以后又可以公开谈论社会学问题了（吴文藻 1986：93）。

中国的社会学1952年被取消，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被指责为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学科，因而只有得到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明确的支持后才可以重建，而胡乔木在

① 据Petzold称，截止1980年，全国有600~800人参与了发展、教育和儿童问题的心理研究（Petzold 1980：5）。

② 同年，费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领导职务（黄树民 1986：4）。

1979年社会学重建大会上正好表达了对其重建的支持(Chu 1983: 8)。社会学很快就得到了费孝通的支持和政府的许可,这表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重新获得了尊重,同时也使得社会学系和研究所的重建及刊物的重办工作容易多了。<sup>①</sup>1980年,复旦大学率先成立社会学系,随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也相继成立社会学系。1981年10月,《社会》杂志出版了创刊号,它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第一本社会学期刊(Chu 1983: 9; 黄树民 1986: 4; 袁辑辉 1983: 20)。

然而,在转变阶段的早期,学者们的情感与职业忍耐力也受到了考验,因为政治风总是一时刮向这边,一时又刮向那边。例如,费孝通起先受了重建社会学所取得的进展的鼓励,于是邀请匹兹堡大学的杨庆堃(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中山大学)到中国来举办一个社会学研讨会。然而,费孝通被指责为“将资本主义带回到中国”。研讨会被迫取消,杨教授又等了几年才有机会到中国来举办一个这样的研讨会。

“民族研究”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被提及的次数也日益频繁,于是民族学也于1978年开始复苏。之后不久,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北京及各省区分别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像杨堃和吴文藻这样的资深学者又开始招收学生和讲授民族学课程。在几所新近恢复的民族院校里出现了民族学专业或民族学系,这使得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很快就得到了承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民族学室正式成立之后,民族学

<sup>①</sup> 费孝通当时是中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主席,费通常是知识分子的代  
表(巴博德 1988: 637)。80年代中期,他陪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出国访问,享受了相当高的待遇。

被中年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sup>①</sup>

然而，年纪大些的民族学家们在改革的头几年都谨小慎微。甚至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成立之后，老学者们还建议人们“不要使用这三个字眼”，即“民族学”这三个汉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仍然将民族学称为“资产阶级的学科”，因此，很多人都害怕与这个前身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民族学会”的机构有太密切的关联。民族学这个长期以来被社会遗弃的学科只能慢慢地在社会上立足。

与那些曾经被禁锢的学科相比，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在改革前没有遭受如此重创，因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其发展过程相对而言也不像它们那样富有戏剧性。随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建立和考古学组在近十个单位的历史系的成立，考古学进入各大学。博物馆、文物局和文物队录用的大多还是考古学方面的工作人员。

在中国一些重要的中心里还保留着体质人类学，其中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最为引人注目。昆明动物研究所 1981 年最先建立了生物学组，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灵长类学领域。同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体质人类学教研室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继续进行人体测量学和其他生物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医学院也因其培养和录用从事与医学和生物人类学最接近的专业领域的人员而显得尤为突出。

语言学是美国人定义的四大学科中的最后一个，它在中国的处境和体质人类学相仿。当时它在中国的大学里不

<sup>①</sup> 只是要求禁止使用“民族学”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这种说法，实质上，在这 20 年的争论过程中，民族学一直存在着（第 12 章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系存在。北京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语言学专业，其他许多学校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置了语言学的课程。在改革后期，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重新出现在中国，但其进程相对比较缓慢。

人类学作为一个连贯和独立的学科领域，其经历略为复杂。1978年，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来，并开始建立一系列的研究所时，许多学者就建议恢复人类学。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国家民族研究规划会议上，又有许多专家呼吁让人类学回到社会科学中来，为民族工作的“六五规划”效力。

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设立一门他们不甚了解的学科。他们知道民族学就是对民族的研究<sup>①</sup>，但是，准确地说来，民族学的范畴是什么？人类学研究又是怎么回事？而且，在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创立另外一门类似的学科吗？

费孝通在1979年还是支持重建人类学的，到了1980年，他又改变了立场。从那时起，他就站到了反对重建人类学的行列中，说中国的人类学摆脱不了其殖民地的影响。有人解释说，费之所以反对，与他所受的英式教育不无关系，较诸南方学者赞同的美国模式文化人类学来说，他更偏向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另外一些人推测说，费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地位刚刚稳固，没有必要耗费精力再去重建另外一门有争议的学科（黄树民1983：4~5）。

① 如何翻译“民族”一词对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可以将“民族”含糊地译成英语的“nationalities”，但没有表达出它用法里的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含义。现在有些中国人赞成译作“ethnic group”，但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译作“nationalities”。

不管他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到了1980年，费已经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否决所有他不喜欢的学术活动了，即使他想这样做也不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明确反对他将人类学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观点。譬如，民族学家秋浦和中山大学的梁钊韬都坚持说，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行得通的，对中国未来的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

争论还在继续，人类学的倡导者们也在寻求他人的支持，特别是著名学者的支持。在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领域，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学者个人还是他们所在的机构来说都很复杂，因为在这些领域都存在独立的组织和机构，且都有一定的声望。这些领域中，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著名的学者加入到了支持重建人类学的队伍之中（如，体质人类学家刘咸、考古学家安志敏和民族学家杨成志），还有一些同样著名的人物却没有加入。

198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中国人类学筹委会”，10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对早期的人类学重建活动给予过支持的机构主要有上海自然博物馆、复旦大学体质人类学教研室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厦门大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活动的中心，它还是中国人类学学会最初的筹备会议及第一次年会的主办单位。1981年5月召开第一次大会，主题是“人类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黄树民1983：1；Rossi 1985：42）。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陈国强当选为学会的秘书长。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两省，福建和广东，高校里重建人类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梁钊韬的支持下，中山大学首先行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各大学70年代初开始恢复教学，考古学已成为历史系的一个专业，那些

年里工农兵学员可以主修历史专业或考古专业。而且，考古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选择民族考古研究方向，它包括一些划归在其他学科名下的民族学和语言学课程。然而，民族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仍然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不能算作一门专业或名正言顺的学科。

## 在中大再生

当关于重建社会科学的大辩论延伸到中大的时候，康乐园（中大校园——译者注）正在经历改革带来的转变，<sup>①</sup>这对它无疑也是一次震荡。在诸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期间，包括历史系在内的许多系的教师戴上了右派帽子，并被强制劳动，他们在“拨乱反正”时得到平反昭雪。仅仅过了三年，这些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教师中的一个，容观复就升到了新成立的人类学系的副主任的位置上。另一个重大转变是恢复了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取消了的学术制度。

随着学术制度的恢复，梁钊韬当上了正教授。他在1964年就已经被批准为正教授，可是决定一直没有生效。<sup>②</sup>1978年，升任正教授给了梁扬眉吐气的感觉，他于是着手为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做些铺垫工作，为实现这一重建，他付出了大量汗水和毕生的精力。同一年，他将陈启新和杨鹤书两位民族学家调到中大，他们一到那里就开始

① 1979年2月召开的党代会传达了会议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李修宏和周鹤鸣1988：91~92）。

② 梁钊韬前一次晋升职称是在30年前。解放前，他被擢升为人类学副教授[此处顾著用的是 associate professor，但是后文中又使用了“助理教授”一词（assistant professor），此职位介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类似高级讲师。参见“焦点之四”——译者注]。

编写民族学教材。梁还说服中大一位在该校学过语言学的中文系教授，他答应，只要人类学系一成立他就调到该系去。梁绕过了正常的录取程序，把他一名最聪明的学生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两年后该生毕业回到中大担任助教。梁一砖一瓦地筹集起了建成人类学大厦所需的师资力量。

不久梁向中大的领导提出要讨论恢复独立的人类学系；他们为他的筹备工作开了绿灯，同意他拟定一个恢复民族学专业、成立人类学系的计划。<sup>①</sup> 梁主要是想申请成立一个包括考古学和民族学两大专业的独立的人类学系。等到以后这个系成熟了，再加上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专业。招进一些合适的教员，并得到财政支持，以收集图书和研究资料。这个计划首先要提请中大的领导通过，这还只是整个复兴过程的第一步；最后还要由北京的教育部来作决定。

尽管中大自己就可以决定成立一个人类学系，但是只有教育部才有权批准学校设立新的专业。如果教育部反对，中大未来的人类学系将只能有一个从历史系分出来的考古学专业，那么人类学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因此，梁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计划，将成立新系和设立民族学专业都考虑了进去。这个提案引发了好多方面人士的兴趣，他们发表了种种意见和看法。

梁和人类学都很幸运，中大当时的一任校长（曾担任过党委书记）黄焕秋本人也研究人类学，他很赞同这一提案。梁还设法利用外界的支持意见来影响中大的领导小组

<sup>①</sup> 1978年以后，已经恢复了包含民族学内容和方法的课程，被称作“民族研究”。只是到了1981年该系成立以后，才重新使用“人类学”这个名词。